

意蕴深厚 独具特色

——读梁恩明《人生逆旅》 □何开四

梁恩明和文学确有不解之缘。他对文学的热爱与生俱来，一以贯之。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我看也摆脱不了笔墨生涯。另一方面梁恩明的文学情缘并非作为票友而存在，应该说，他是一个有独特个性的作家，其作品的意蕴、作品的艺术传达极富特色，经得住岁月的洗染，我不妨抽出点，以概其余。

读《人生逆旅》，首先使人感到的是作者的真实。我这里的真实主要指的是精神的真实。文学创作说到底也是作者的心灵和情感的审美对象化。人的精神世界在很大程度决定了文章品位的高低，人性中最本真的东西是文学焕发光彩的源头活水。现在很多所谓的文学创作最缺失的就是这一点。人事从胜，人生多故，反掌荣辱，转浊盛衰，使人戴上了厚重的人格面具，再加上社会的浮躁，说谎成本的低廉，所以“贾雨村”、“甄士隐”一类的人物最容易粉墨登场。写文章成了写面具，自传成了他传，他转成了自传。作者都是恂恂如也的君子，以至于钱锺书先生浩叹“文章不足征人品”，“大奸能为大忠之文”。这是文学的异化，也是文学的悲哀。读梁恩明的散文，所以生了这些感慨，正是因为其作品的个性化，情感的自然真挚，人品和文品的一致，和那些“伪文学”判然有别。《再相逢》是一篇带有回忆性的文章，写的是高小时的班主任老师张星茹。按照通常的写法，往往是对老师的颂扬。作者的开篇则是：“三十多年过去，她留给我的感觉：是一位过于威严，不苟言笑，很让学生惧怕的师长。老实说，我一点也不喜欢她。”继而以冷峻的笔墨状写了在封闭的年代中一代学子心灵的苍白和扭曲。作者批判的眼光实际上并不是针对具体的人，而是有很强的社会批判力量。经历过那个荒诞年代的人，心中都会留下阴影，而梁恩明富于个性化的书写，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兄妹之间》以祭奠父亲的事由，写了作者和四妹的隔阂。这里面固然有因经济地位的不同和价值取向的差异造成的观念及情感的落差，也有岁月悲剧酿成的历史伤痕和自身的愧疚，千头万绪，说明不透，道不清，呈现出心理学上典型的“杂糅情感”。而文章结尾的祝愿把这种情感表现得十分真挚：“我只愿你的在天之灵，保佑四妹，她才四十岁，她的人生太艰辛了。我不希望她像我，但也不希望她像你一样走完她的人生。父亲，你听见了吗？”这是从心田中汨汨流出的情愫，自然而真切，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莫斯科郊外的老人》则是一篇带有英雄情结和沧桑感的文章，但同样真挚自然，没有作秀的成分。文章写了一个当年参与过反法西斯战争的红军老战士晚景的凄凉。如果我们把血性贲张、金戈铁马的岁月称为史诗，那么，平庸懒散、浮华空洞的现实就是“散文时代”。正是在史诗和散文的交织中，作者感慨系之。他敏锐地捕捉到现实中英雄主义的缺失，感染一个伟大民族褪色的褪色。另一方面作者对这位老人的礼赞，正是自身英雄情结的外化和投射。“我真不敢相信，眼前这位不起眼的老人，竟是我心中崇拜已久的稀世英雄。他祥和的皱纹，一点不显当年横扫过狂魔的霸气，一点不像他周围的后生们，个个冷漠自傲，还把没落帝国的荣耀强撑在脸上。老人显然也很鄙视他身边这些无视他存在的后生。”这里感情的倾泻取向分明，彰显了一个人的真性情。文如其人，老生常谈，然而谈何容易哉！在梁恩明的文章中，我们感到了两者的合一，确属难得可贵。巴金先生晚年讲的最多的是“讲真话”，实际上，文学进步的逻辑前提就是从讲真话开始。

文学传达感情，文学也传达思想，甚至在一定的意义

必须承认，在灰蒙蒙的时空里经历的这一次阅读，开头是烦躁不安的。

不知不觉，这些看似寻常却又潜藏着无限深意的文字让我的心不仅平静下来，而且沉浸进去，继而莫名兴奋起来——我看一个赤诚的灵魂，一个少有的真诚的写作者，他生动鲜活地站在我面前。

并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让你见字如面，尤其是在文人大都戴着面具的当代中国文坛。

然而，梁恩明让你见字如面，见字如心。他袒露着，让自己的笔墨、自己的心灵在天地间自由地挥洒，承受太阳温和而又热烈的照射。

就是再矜持的读者，在这样赤诚的写作面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隐于中国西南的写作者梁恩明不是专业作家，与他的认识出自于他的文字。上世纪80年代，他就在《四川文学》等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相当有深度的散文和文艺评论作品。作为一个文艺理论研究者，我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少有的率真和灵动。他在文字中坦承，他是一个大俗人，而且承认得自然、坦然。

我就欣赏他这一点。

人非圣贤，岂能不俗？世面上那些干哪一行就把自己刻意打扮成那一行代言人模样的人，比如搞所谓国学的就穿长衫，搞美术的就扎小辫，多半是装腔作势。

梁恩明明白，这个世界本来就俗，所以他不装。所以他难得。

因为不装，他的心胸才开阔，他的文字才流畅。文雅的说法叫做“感同身受”，来不可遇，去不可止；或者说“率性为文，思发于胸，言泉流于唇齿”。

这是一种写作的心境和说话的姿态。在一个人们普遍不说真话、虚张声势的时代里，自由地表达，真诚地表达，选择做那个揭穿皇帝新装的小孩，这无疑需要一种极大的勇气和智者的勇敢。

遍观梁恩明的写作，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散文。这些散文带有强烈的纪实色彩，或隐或显地取材于作者的人生经历；二是小说，这些小说中的人物也基本是他自己最熟悉的身边人，不用过多虚构，几乎信手拈来；三是他带着思索的目光游历世界时自然流露出的游记文字。这些文字是他最直接的心灵展示，处处闪动着一个多思、敏感的作者鲜活的人生感触和思考结晶。在这三种文字里，都闪耀着一种可贵的价值：直陈生活的艰辛和人性的阴暗，无情剖析自己灵魂深处的渺小与卑污。

在那些充满复杂难言情感的纪实性散文里，梁恩明记录下自己与之相交的朋友、同学、老师，记录下他们卑微的生活和心灵所遭受的磨难与痛苦。在这些文字中，梁恩明流露出对所有苦难者的深深怜悯与同情，也不排除对自己侥幸逃脱苦海的极度庆幸。他的可爱之处在于他并不认为自己善良可爱，相反，他反而大方地承认是自己的狡猾与势利使他在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世道里如鱼得水。在人生的重重进逼面前，谁都不可能是道德的完善者。原则与道德的束缚只属于那些胆小的失败者。他说：“我的幸运，更多得于我与人、与鬼的圆融，随机应变的灵巧。有人说，人间天堂，更偏爱于奸诈的人，我不知这是不是人生真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21世纪，一定不屑于中

上说，思想是文章的灵魂。梁恩明有独立思考的品格，他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乃言他人所未发，辟他人所未辟之境。而且往往一言既出，发唱惊挺。但是他的识见并非“短笛无腔信口吹”，而是做到言必有征，语无虚发。这得益于他数十年的积累。人们常说，有多大的经历干多大的事。就人生沧桑而言，他明显较常人丰富。加之他阅读面广，特别是对历史尤其是军事史的谙熟，使他有了发言的底气。又因为多年的周游列国，有了可资参照的比较。所以他为文的纵横捭阖，激扬文字，酣畅淋漓，很容易给人以感染和启迪。《朝鲜行》中对当今朝鲜现状别具一格的理解，就蕴涵了他自己的人生感悟和对中国60年变迁的领悟。《旅欧感叹（二题）》发出参观凡尔赛宫的感慨，折射出了思想的光芒。特别是以凡尔赛条约对日后法西斯德国肆虐世界进行的反思，就蕴涵了深厚的历史知识根基。而《北欧六日记》对世界各国社会制度选择的多样性，对北欧福利社会的认识，就得力于多种国度参照系的比较。作者摒弃了线性思维，思维的发散和广度有如天马行空，自由驰骋。大千世界，辨析疑、人生憧憬，无不归而包之。这在他2012年的新作《贝加尔湖》中更是得到了淋漓的表现。作者多维度的思考和旅游的移步换影中蕴涵了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内容。从苏武牧羊的苦寒到《尼布楚条约》的荒诞，从西伯利亚军团的神勇到高爾察克的迟暮，从内战和外战的关系到今天俄罗斯民族对战争的理解，历史风烟弥漫于字里行间，作者遂飞的逸兴、仰天的感喟，颇有壮士铜头铁琵琶唱大江东去的气概。而其中对俄国十二月党人的评骘，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贝加尔湖和邻近的伊尔库茨克，是当年十二月党人的流放地。东西伯利亚漫天的风雪，仿佛已将这段历史深深埋葬了。“可我很难将教室里纸糊的破窗、昏暗的油灯，还有墙上那小孩幼稚的图画，与一个出没于宫廷的贵夫人相连，更难把将军的英姿还原在炉火燃烧的铁匠铺里。而这，又恰恰是十二月党人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发出的光和热。或许，当年这里的民众并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来到这里，但他们在乎，耗尽心力所做的启蒙，却得到了当地民众深深的爱戴。”作者这段诗性的文字交响着历史的华彩，进而迸发出智慧的火花：“伊尔库茨克，这个远离莫斯科的州府，最容易闹独立的边陲，在苏联解体时，竟然没有脱离俄罗斯，自立为国！不知是十二月党人在这些蛮荒的土壤里，最早播下了俄罗斯的文化的种子，还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十二月党人有剪不断的魂影？”“昨夜下过一场大雪，这里的枫林红了。我的朋友说：那是十二月党人的血染红的。”行文至此，你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善思和卓识，它大大超越了一般作家舞文弄墨的风月谈，而有了思想者的风采。它既是对十二月党人的礼赞，也彰显了文化的力量。

当然在表述上，梁恩明也并未让思想“裸奔”，他把散文的叙事、写景和随笔式的议论有机融合，羚羊挂角，天然淡泊。《贝加尔湖》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有生动的体现。像《尤科长》《肖二娃》《赌局之外》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尤科长》是官场小说，作者以轻松的笔墨塑造了令人发噱的小公务员的形象。《赌局之外》则写出了商海沉浮、官商暧昧、尔虞我诈的社会众生相。《肖二娃》更值得关注。作者善于在特定的语境中塑造人物，环境的描写和人物的精神世界丝丝入扣。他描写的那个小巷密布、垃圾四散、喧闹嘈杂的棚户区，正是肖二娃这一类人物精神的物化。肖二娃们为改革支付了成本，但并未真正享受到改革的成果，是被边缘

化的零余者。小说写道，“世道在他们眼里颠倒了，他们疑惧改革的前景而怀念过去。这就是他们思想的主流。”老人还在说：“二娃的神经可能出了毛病，他这个月一天到晚就睡在床上，起来就抱起吉他又弹又唱，四邻都在笑，说他只吼得来《国际歌》。”肖二娃们的精神状态和心中积蓄的愤懑由此可见。作者还善于用细节刻画人物，其中的一些观察可谓入木三分。聊举一例，以概其余。“斜对门的张婶，这时端出一盆热气腾冒的滚汤，搁放在张三娃的脚底。五大三粗的张三娃拧着提刀，鲁莽地背过鸭颈，横刀一抹，还没见血，就甩手放生。扑闪乱蹿的跑鸭，仰颈一声哀鸣，喉头一股血涌，血珠淌浸在地面，牵出一绺喜庆的红绳。张婶佝偻在笑，提刀拭血的张三娃也咧嘴在笑。从他们杀鸭取乐的发泄中，从他们欣赏活物临死前痛苦的呻吟中，我仿佛觉得满天的阴霾都塞进了胸中。”这是小巷风流，这是小巷的精神生活，这是底层草根的精神图谱。他们都是本分的人，他们也是我们的父老乡亲！如何让他们也尽快富裕起来，如何让他们有健康的精神生活，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忧虑的深广和表达的练达都发人深省。

男人的阳刚、血性、力量的劲道，乃至某种攻击性，构成了梁恩明文学叙事的基本艺术风格。这也许和他是重庆人，有“巴蔓子”的遗风有关。生活中的梁恩明给人的印象就是执拗、坚韧，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还要撞的人。加之他善于辞令，雄辩滔滔，辩才无碍；发而为文，就成了一种难得的气势和文学特有的“气场”。他的作品令人看了神往，其源也盖出于此。但另一方面，一味的强悍也有用力过猛之嫌，所谓挠挠者易折是也。梁恩明于此也早有会心。他文章的风格在强势中也同样跌宕有致，摇曳多姿。除了情感的真切和长于写景外，其文字突出的特色是幽默。哲学家康德说过，幽默是理性对对象的自由戏弄。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幽默则是人的一种气质，它多表现为通达、机智、自嘲和嘲笑对人生的乐观。正是幽默的介入，使梁恩明的文章增添了灵性和活力，也大大缩短了读者的阅读距离，甚至可以说，他文章的节奏是以幽默来调节和转换的。《旅欧感叹（二题）》中，作者有一段文字，是写因被洋人视为“另类”而生的感慨：“现在的文明人，肯定在世上是最先野蛮的。要当君子，必须先学会做小人，学会做贼。我们最大的遗憾是：做贼做迟了，所以才是贼。”在这段痛快淋漓的反讽后，作者继之以一段幽默的叙述，把他放在荷兰国艺馆做“活雷锋”拾金不昧的故事描绘得活色生香。最后是失物者，“那两位女郎，文明血统的高贵女郎，在向我，蒙昧丑陋的我，真诚地、恭敬地，深深鞠躬。这时，我内心的欢愉，简直比拿了他们的钱物还要畅快。”这种在诙谐中的柳暗花明，富于情趣，增添了文章的魅力。还要说的是梁恩明的幽默不是刻意为之，往往随意点染，源头活水，不绝而来。现在不少人的作品不耐读，缺乏灵性，是和情趣及幽默绝缘有关。写文章需要有一个相对自由的心境，你要摆出一副寡妇脸，或是一味正人君子相，那就正如鲁迅所说：“可多么讨厌！”而梁恩明的文章在这一点上也给我们以启迪。

前贤有云：非人磨墨墨磨人。说的是文字生涯的艰辛和对人生的消磨。不过，梁恩明未必如此。尽管写文章对他来说只是余事，但他磨墨盎然，快乐写作，斯亦性之所然也。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官海弄潮，商海弄潮，文海弄潮，而且都要弄出个玩意儿来。这是梁恩明的宿命。

在写作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生逆旅》的作者更加突出强化的是他的民间知识分子立场，字里行间也彰显出他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更加自觉的文化认同。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富里迪指出“定义知识分子的，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所以，知识分子是“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梁恩明长期不懈地坚持文学写作，只是为了表达和描述自己对社会和人生、历史与现实、战争与民族、本土与全球的种种个人化的认知和思想，是一种超越了名利意图的思想表达。而他的思想表达也正是为了维护一种人文主义价值和社会正义理想。换句话说，他是以知识分子立场来从事写作的。因其如此，他的写作才体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思想风格和个性张显的批判精神，并使社会批判与自我批判融为一体的话语方式，成为《人生逆旅》的另一个叙事特质。无论是小说和散文，作者都有深切到位的人文关怀和正义关切。这样的人文关怀和正义关切，除了体现为对底层平民的普遍同情、对民族利益和全球正义的个体关切之外，更浓重地表现在社会批判与自我批判相互对话的逻辑关系之中。社会批判是现实主义的叙事原则，《人生逆旅》中的社会批判除了表现出对民族历史的反思和对社会现实的审视之外，总体上更集中地体现在作者自觉地自我批判之中。正是经由自我批判的言说路径，作者的思想和识见都抵达了社会批判的历史深度。《兄妹之间》《贝加尔湖》《德国日记》和《肖二娃》均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深入辨析《人生逆旅》的批判意识，可以发现一个意味丰富的叙事现象：作者的自我批判一方面提升了叙事的精神境界，拓宽了文本的思想内涵，深化了作品的文化意蕴；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式的自我批判，也在无形之中与作者的中产身份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作者拥有的多重身份在叙事中也在不经意之处呈现出对话与冲突的审美张力。作者内心深处那种顽强的知识分子情怀和批判精神，则又以更强大的理性力量，意图超越功利主义和中产偏见，表达对社会现实更深入的正义关切。所以他对我内心的“中产意识”、对某些为富者的虚假人格，始终持有一种深刻的反思和能可贵的自我批判。在《俄罗斯见闻》中，作者描述了在莫斯科郊外偶遇妓女的细节。当妓女们发现他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便嗤笑而去时，作者一触即发的爱国情绪中虽然也挟杂着一些中产心态，但瞬间过后，作者又冷静下来，自省意识也回归到理性的轨道：“我刚寻来一方净土，又让不净给抹去。这世界上哪里还会有净土？像我这样花天酒地的人，还配去寻净土？”这个精彩的细节描述，着墨不多，貌似简单，却有丰富深刻的人文内涵，它将中产偏见和历史记忆、自我反省和社会批判有机地融为一体，细心读来，耐人寻味。

更加耐读的文本还有不少。其中《兄妹之间》也是一篇内涵丰厚韵味苍凉、自我反思与社会批判融会贯通的优秀之作。兄妹之间同出一脉，理当情如手足。但现实的残酷在于，贫穷和疾病却常将亲情连根拔掉。面对贫困境遇，为改变人生命运，兄妹之间的抉择大相径庭。为兄的选择摈弃了对亲情的维护和对孝悌的遵从，为妹一方则以牺牲自己辍学回家担重任。而更为严酷的现实是，20年后，为兄的作者成了社会的成功人士。而在棚户区的妹妹则在下岗后只得卖鸟谋生。兄妹之间贫富悬殊，已然就有阶层之隔，社会不公演变成兄妹失衡，所谓同情手足已变得遥不可及。面对此种悲凉而悬殊的人生际遇，作者以其复杂纠结，爱恨交加的无奈心态和犀利眼光，一方面质疑金钱至上的功利社会，批判唯利是图、嫌贫趋富的世态人心；另一方面，作者也从中审视自我，反思自我的成功道路与现实的浊流关系。作者不仅批判自我身上的伪君子气，那种混世的圆通和奸诈，而且亦发现它与社会思潮、时代意识之间的文化关联性以及人性的复杂性，从而将自我批判与社会批判融为一体，提升了批判的历史高度，也深化了批判的文化力度。

梁恩明在叙事中更加认同知识分子的身份，其写作也在总体上选择了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立场。这种对于知识分子立场的自觉选择，放在当今文坛是有特殊意义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实践便流行一种“去知识分子化”的写作思潮。这种思潮在批判知识分子写作的精英取向时，又矫枉过正，把启蒙理想和人文主义一锅倒掉，以至造成文学审美意识的混乱和精神价值的漫患，文学写作失去了对公共事务和叙事对象的准确判断，缺乏表达精神价值和思想力量的能力，也在不同程度上损耗了文学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当此之际，回头来看梁恩明的写作实践和叙事立场，那种对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自觉认同和执著守候，就有一种值得尊重的审美品质蕴藏其中。

梁恩明十分清楚自己灵魂深处的这种悖反性，并像直面人生一样，正视这种悖反性。他在《再相逢》里有清醒而明确的表白：“我做了保尔，也没想过要在生活中去做保尔，但我身上绝不缺少保尔的精神。我恰是用了保尔的精神，去干了保尔要革命铲除的那一类事。”

对于梁恩明来说，活在悖反中就是活在真实中，活在真实中就是活在悖反中。

四

梁恩明喜欢旅游，不，是喜欢游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旅游不再是单纯地观光，而是像徐霞客一样，行走、记录并思考。他的旅欧游记、朝鲜之行等篇章，都带着浓厚的人文思索，有着鲜明的梁式印记。梁恩明从来人云亦云，他总能得出独到的见解，并且毫不隐晦地说出自己的结论。在《朝鮮行》一文中，在这个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度里，梁恩明用白描般的文字，写下了近乎荒诞的一幕幕戏剧。他最得意的一篇是《贝加尔湖》。作为一个1960年代生人，梁恩明的成长记忆里苏联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深深烙印，那里的一切如今怎么样了，他要急切地去寻找，去印证，因为那可以说是他的精神成长的一环，有着母乳般的意义。可是，如今的俄罗斯仍旧博大美丽，仍旧广阔无垠，但留给他的却是一个暧昧不明的背影，是一个寻找不得的青春的背影。这篇文章，笔者认为是梁恩明文字里最发达、最汪洋恣意的一篇，华丽流畅，激情充沛，如遥远国度里的冰雪和白桦充满神秘与张力，浓郁非常。有很多的游记只是记录美丽的风光与奇异的民俗，但梁恩明从来不是这样，他总是去发现那些风光背后的含义与不凡，发现文明之间的差异，并鲜明地表达出来。《旅欧感叹（二题）》是如此，《俄罗斯见闻》也是如此。这让他的游记变成了文明之旅，文字之旅，思想之旅。他的文字在游历中变得更灵动、更自由，因为在陌生的世界里有了对比，梁恩明的个人符号变得更鲜明，他的思考才更有独特之处。

从古至今，所有认真的作者都勤于思考、迷恋思考。可以说，宁静的大胆的沉思是真正的写作者的本质。写作者认真思考往往是为了寻求文明的终极意义。从整部文集的文字可以看出，梁恩明在写作和思考时并不作状，更不矫情。他不追求语言外在的柔美光泽，也不规避对于平庸琐细的如实呈现，却能于平静处起波澜，在曲折中现跳脱，这是袒露着的情感和沉思的需要。

他的文字时而简单朴实，时而汪洋恣肆，时而顿挫沉郁，时而幽默佻达，但字里行间总透着一种灵魂步入自由之境时才能达到的自如潇洒。灵魂的张扬使得文字才能张扬，内在力量溢于纸面。这种文字间的力度是控制的力度，是精神的力量。

《人生逆旅》里的所有文章各自以其独特的香与色动人地摇曳在那里，现仅拈出其中我以为堪称“诗眼”的部分与诸君共享。正如陆机《文赋》所言，“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一直逼灵魂的写作正是梁恩明文章的枝干，也是他写作的活水源头，正如春光到处柳丝金线、嫣红姹紫，笔下一片生机。

重点扶持作品评论

直逼灵魂的写作者

□廖全京

引）无论这种自审在深度和广度上有多少欠缺，也无论它与人们常说却也只停留在说上的“忏悔”还有多少距离，但梁恩明起码对得起自己了——他在无意间透露出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良知。

三

在那些纪实性的散文与小说里，我还看到了梁恩明在揭示自我灵魂时艰难的内心挣扎。

歌德曾经说过的“人的历史就是人自己”。这话既针对整个人类，也针对每一个生命个体。与其他不同的是，梁恩明的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不是他的事业，而是他的写作。写作者的身份让他不同于普通的商人，对文学本能的热爱和对人生繁杂的思考，让他的人生更加完整，让他的生命体验丰沛而富有深度。他用笔写下这一段人生与社会，也烛照自己的灵魂。

他经历了两个时代：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梁恩明的心灵在这两个时代穿越，两种显在和潜在的引力作用于他的灵魂而摩擦出的火花，使他的回忆成为伤感与困惑的“混搭”或“拼贴”——一种中国式的后现代文本，其特征是带着人的本性的双重性，这正是他的心迹的逆向、冲突、悖反的根源。

有一篇小说在梁恩明的文集里意义深远，即《肖二娃》。作者的昔日好友肖二娃，跟自己从小一起滚过铁环、抽过烟。改革开放后，“我”成功了，工人肖二娃却下了岗，搞过传销，卖过报纸，推销过牙膏，无一例外地失败，最后只剩下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要不就抱起吉他吼《国际歌》。这篇短篇小说，看似